

晋陕戏曲新格局下“走西口”题材的融合路径研究

Research on the Integration Path of the “Zou Xikou” Theme under the New Pattern of Shanxi-Shaanxi Opera

刘依佳*, 于星月, 王翊达, 蔡静

大连海洋大学

摘要

以马克思主义“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基本原理为指导,本研究围绕“走西口”移民历史语境,系统考察晋、陕地区戏曲艺术的整合转型机制。研究发现,以《走西口》为核心题材的戏曲创作,在实践中形成了一条以戏曲共通的民间母题为联结纽带,推动跨剧种技艺互鉴,实现地域审美文化融合共生的特色融合路径,推动晋、陕两地戏曲在剧种形态、音乐体系、表演程式与审美取向等层面实现系统性交融。这一路径植根于“走西口”带动的物质交往与社会结构变迁,既具象印证了社会存在对文化艺术的塑造作用,也充分展现了文艺对社会现实的能动反映与价值升华。

Abstract

Guided by the basic principle of Marxism that “social existence determines social consciousness,”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historical context of “Going West Mouth” migration and systematically examines the integrated and transformative mechanisms of opera art in the Shanxi and Shaanxi regions. Research shows that opera creation centered on “Going West” has, in practice, formed a common folk theme as a link, promoting cross-genre skill exchange and achieving regional aesthetic and cultural symbiosis through a distinctive integration path, and systematic integration of Shanxi-Shaanxi opera in terms of genre form, musical system, performance form, and aesthetic orientation. This path is rooted in the material exchanges and social structural changes driven by the “Going West Gate,” vividly confirming the role of social existence in shaping culture and art, and fully demonstrating the active reflection and value elevation of art in social reality.

关键词: 晋陕戏曲新格局; 走西口; 戏曲融合; 路径

Keywords: The New pattern of Shanxi and Shaanxi Opera; Going West; Opera Integration; Path

一、引言

“晋陕戏曲新格局”是晋陕戏曲传承迭代的时代态势，时间范围为21世纪初（2000年前后）至今，分为2000—2015年依托非遗政策、推动戏曲从被动保护转主动传承的形成期，以及2016年至今借文旅与数字化升级、以2025年晋陕豫戏曲惠民交流周为标志突破地域边界的成熟期，衔接明清梆子腔传承脉络；其以“传承与创新共生”为核心，体现在创作、表演、传播、产业、传承五大维度的协同发展，为晋陕戏曲发展指明方向。

“走西口”是中国近代乃至近代以前一次规模宏大、时间跨度大的人口迁徙活动。这并非单纯指空间上的移动、社会结构上的一种转型变迁。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明确指出：“观念、思维、人们的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关系的直接产物”（马克思 & 恩格斯，2012）。在这种广阔视野的把握下，“走西口”可归为物质生产实践活动。恩格斯在晚年通信中特别强调：“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马克思 & 恩格斯，2012）。这一重要论述为我们深入挖掘晋陕戏曲融合的复杂机制提供了更全面的理论视图。

戏曲艺术一方面受社会经济基础的制约，另一方面又具有相对独立性，能够通过自身独特的美学形式对社会现实产生能动的反作用。梳理既有研究成果可见，当前学界已对“走西口”的历史发展脉络完成较为清晰的梳理，也对其经济动因开展了深入探究，针对晋陕两地戏曲的个案研究也已取得一定进展，但将二者相结合、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分析视角，具体阐释单一剧目如何发挥艺术能动性、参与塑造特定区域戏曲发展新格局的研究仍较为匮乏。

本研究尝试对现有文献中的不足进行探讨。提出经典剧目《走西口》，其本质属性绝非简单地被动映射历史进程，而是在晋陕戏曲艺术相互融合的历史进程中的主动建构。实例表明，该剧目通过跨戏曲类型传播及其艺术再生产，不仅革新了戏曲表现形式，更塑造了所谓“西口文化圈”内部共同情感与文化认同。这一现象充分印证了艺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形式，既受制于经济基础，又具有相对独立性并能能动地反作用于社会存在。

采用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思路是本研究的显著特征。本研究以“走西口”背景下晋陕地区戏曲交融现象为研究对象，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分析框架、戏曲艺术的形态学研究范式与历史学的考证方法加以综合运用，并以《走西口》相关民歌、二人台与晋剧剧本、演出资料及相关历史文献为主要研究材料。在具体研究中，通过文本细读，对相关作品的叙事内容、语言表达、音乐形态及表演内容进行分析，以揭示晋陕戏曲艺术交融的具体表现；运用比较分析法，对二人台与晋剧在题材内容、语言、音乐及表演等方面的艺术要素进行比较，考察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及交融特征；运用史料考证法，对“走西口”人口迁徙的历史过程以及晋陕地区戏曲传播、流变的相关史实进行梳理，为戏曲交融现象提供历史语境和事实依据。在此基础上，本研究力图从社会历史变迁与戏曲艺术演进相互作用的视角，阐明“走西口”背景下晋陕戏曲交融的形成过程、表现形态及内在机制，从而在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中把握其发展规律。

二、“走西口”背景下戏曲融合的物质基础与意识形态升华

“走西口”带动的大规模人口迁徙与跨区域物质交往，既打破了地域文化封闭格局，也为戏曲艺术的传播互鉴筑牢了物质前提。立足马克思主义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原理，物质生产与交往形式的变革，必然推动民间精神文化不断凝练升华。源于民间生活的情感叙事与口头传说，也在这一历史进程中逐步被艺术化加工，最终形塑为具有跨地域共鸣的戏曲母题。

（一）作为经济基础的人口迁徙与交往扩大

“走西口”这一历史现象的存在，本质是晋陕地区劳动者们在特定生产资料状况与生存环境限制下所做出的被迫性抉择。清代至民国时期，“地瘠民贫，生计艰难”的状况普遍存在于晋北陕北地区，乾隆《保德州志》称保德“地瘠民贫，生植不广”，农人“遇丰年差足糊口，荒年冬储蔓菁，春以谷糠采茶，

杂而食之”（殷梦高，1758）。这种矛盾激化，反映出本地土地资源之匮乏已无法容纳过剩的劳动人口。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审视，劳动力商品化的历史进程在此得到充分体现，蒙古地区生产资料与晋陕过剩劳动力的结合正是通过“走西口”这一途径得以实现。当地民谣“河曲保德州，十年九不收；男人走口外，女人挖野菜”即是这一生计困境的真实写照，相关研究也证实了晋陕沿边地区大规模出口谋生的人口流动（闫天灵，2004）。原有地域封闭状态被如此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所打破。物质交往的扩大化特征显著呈现于这种人口迁徙运动中。精神交往活动诸如戏曲传播等所需之前提条件由此得以奠定。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域中得以揭示的是生产与交往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即交往的形式归根到底由生产所决定。实证研究显示，“走西口”移民运动不仅推动了蒙汉民族间物质产品的交换互动，也带动了跨地域精神产品的交流传播。戏曲班社作为特殊的精神生产组织形态，其流动路径与移民迁徙轨迹呈现出高度耦合性：山西戏班沿移民路线进入陕北及内蒙古地区，同时陕西艺人群体也呈现出反向流动特征，这种双向艺术人员流动构成了区域内戏曲艺术融合发展的物质基础。需要指出的是，这一进程中的文化交流并非单向度的文化传播，而是植根于新型生产方式之上的文化创造过程。“走西口”历史进程中催生的新生产关系，为戏曲艺术的创新发展提供了必要前提。

（二）从民间传说到戏曲母题的意识形态升华

《走西口》这首民歌最初是劳苦大众表达离别哀愁、记录生活艰辛的民间情感载体。歌词中“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实难留”等朴实语句，真切展现了特定社会背景下普通人的真实心境。从最初的民歌形态，到发展为“二人台”，最终被“晋剧”等大型戏曲剧种吸收改编，《走西口》实现了从单一地域叙事到跨区域戏曲主题的演变。这一演变过程印证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观点，即文艺创作要“把这种日常的现象集中起来，把其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毛泽东，1991）。戏曲形式的《走西口》不再停留于个人情感的零散式表达，而是通过塑造典型角色、环境以及构建典型情节，反映了晋陕地区移民群体的心路历程，从而升华为更具普遍意义的社会意识形态。相关研究指出，“走西口”移民运动在推动各民族经济互补交流的同时，也促成了不同地域、不同民族间文化的兼收并蓄与深度交融（陕劲松，2016），《走西口》剧目的广泛流传与演变正是这一历史进程在艺术上的集中体现。这一创作过程深刻体现了艺术生产的独特性，它既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又实现了对社会存在的突破与超越。运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分析，《走西口》既呈现了移民群体与其生存环境的真实联系，又通过艺术化的表达方式重新诠释了这种关系。

三、唯物辩证观视角下二人台与晋剧的剧种交融分析

在跨地域文化交流进程中，二人台与晋剧围绕《走西口》题材形成的艺术交融，是戏曲文化演进的典型缩影。以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为分析视角可以发现，这一交融过程既根植于人口流动、地域交往等客观物质条件，又在艺术实践中呈现出对立互补、互促共生的辩证关系。

（一）传播路径与文化生产的唯物论基础

《走西口》剧目的广泛传播，体现了“物质决定精神”的唯物主义原则。其传播轨迹与历史上“走西口”移民活动形成的交通网络和人口分布格局呈现出高度耦合性。黄河沿岸的河曲、保德、府谷等重要渡口，作为移民迁徙的起点，自然演变为该剧种的主要发祥地。戏曲表演团体的流动性并非随机行为，而是严格遵循移民群体的分布规律，以满足特定社会群体的文化消费需求。这种由戏曲表演带动的移民群体迁徙，有力印证了精神文化生产对物质生产活动的依存性。从传播学视角审视，该剧种的扩散过程呈现出典型的层级式传播特征，其传播路径可梳理为：首先在核心发源地完成艺术形态的初步定型，随后沿着移民迁徙路线开展空间扩散，在扩散进程中持续与迁入地的区域文化要素产生互动融合，最终发展为多元分化的艺术形态。这一传播模式既受到自然地理屏障的空间约束，又受到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深刻影响，充分体现出文化生产与物质条件之间存在强关联性。

（二）跨剧种艺术融合的辩证关系研究

该剧种在二人台与晋剧两大戏曲体系中的差异化呈现与交互影响，为矛盾普遍性原理提供了典型案例。两种戏曲形式在艺术表现维度上各具特色，构成了矛盾统一体的两个方面。

1. 叙事内容的交互

二人台版本侧重日常生活场景的细腻描摹和情感表达，具有鲜明的写实主义特征，而晋剧版本则依托其完备的角色体系和叙事架构，置身于更宏观的社会历史背景，展现出更强的典型化特征。以晋剧版新增的“迁徙艰险”与“边疆拓殖”叙事单元为例，不仅强化了戏剧张力，更深刻揭示了移民史的社会意义。这种叙事层面的互补与重构，完整呈现了艺术创作从感性认识到理性抽象，再到艺术再现的辩证发展轨迹。

2. 音乐体系的融合

音乐元素的交融是该剧种跨体系传播中最显著的特征。晋剧的梆子腔系统具有严谨的结构规范和丰富的板式变化，具有体系化特征；二人台音乐则植根于民间歌谣，具有情感真实性。艺术融合中，晋剧的板式结构为二人台注入了更强的戏剧表现力，特别是在刻画人物心理冲突时，二人台有效借鉴了晋剧的专业板式。与此同时，二人台质朴生动的音乐语汇也为晋剧的音乐创作提供了可能性，增强了民间情感的表达维度，实现了专业规范与民间特质的有机统一。相关研究表明，二人台唱腔融合了陕北民歌、晋北民歌与蒙古族民歌等音乐元素，蒙汉双语交替演唱的“风搅雪”形式更是汉蒙音乐文化交融的直接体现（邵路垠 & 赵彬彬，2023）；这种音乐层面的交融不仅是艺术形式的借鉴，更是不同区域人群通过艺术进行情感交融与文化认同建构的生动体现。音乐艺术的跨形式融合不仅彰显了艺术演进的内在逻辑，更揭示了多元社会群体借助艺术互动达成文化整合的历史轨迹。从马克思主义美学维度审视，这种融合现象呈现了艺术内容与表现形式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新兴的社会文化内涵必然催生与之相适应的艺术表现形态，而艺术形式的创新突破又进一步深化了内容表达的丰富性。这种动态统一，构成了戏曲艺术持续演进的内在驱动力。

3. 表演体系的互补

在表演艺术体系层面，晋剧的程式化演绎与二人台的生活化呈现形成了互补。晋剧的程式化表演体系是对传统舞台艺术经验的系统性归纳与升华，具有鲜明的规范特征；而二人台的表演风格则源于日常生活，更具生活质感与情感真实性。在《走西口》的艺术实践中，两种表演体系实现了深度的互鉴与融合。晋剧表演者通过吸纳二人台的生活化表现手法，使其程式化表演获得了更为真切感染力；与此同时，二人台演员借鉴晋剧的程式化规范，显著提升了表演的艺术水准与专业程度。这种表演体系的创造性融合，不仅拓展了戏曲艺术的表现维度，更在整体上提升了戏曲艺术的审美价值与专业水准。

四、戏曲艺术要素融合中的能动审美反映阐释

艺术是社会生活在人脑中能动的审美反映，也是艺术主体对民间实践、地域文化与群体精神诉求的创造性提炼。相较于剧种间的表层形式互动，“走西口”语境下二人台与晋剧的艺术要素交融，更深层地体现着实践根基与审美创造、地域表达与群体情感的双向契合，是艺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生动印证。

（一）表演形式

综合各种表演形式，我们更加清醒认识到社会实践是艺术创新的唯一土壤。晋剧表演体系规整且严苛，它是对历史舞台表演手法的归纳固化，是高级的社会实践行为，而二人台的表演更多是晋陕人民的生产劳作现场，呈现为对生活场景的真实记录。

在《走西口》表演中，两种戏剧样式成功嫁接，一方面是晋剧艺人通过模仿二人台的表演方式，将原先纯形式的舞蹈如水袖、步法等融入真情表达，避免形式主义；另一方面，二人台艺人从晋剧的身体语言中学习到许多东西，使他们在保持真实日常的同时又能更强地表现并美化形式。二者的有机统一，体现了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倡导的“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与“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毛泽东，1991）的辩证关系，同样印证了艺术形态的进步源于生活与艺术体验的融合演进。

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来看，这种结合模式表明感官操作在艺术制作中具有重要作用。马克思在《关

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马克思 & 恩格斯，2012）。戏剧演出艺术的成长取决于艺术家的操作与人们的生活，从这些操作中生成表演规则，并随着操作实践不断生成，改变与再生成。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实践本身并不是简单的经验过程，它是一个消解矛盾、实现创造的过程。以往表演规范在此不仅保留了可行部分，而且丰富了新的内容，促使艺术形态创造与发展。这使得戏曲表演艺术在保持传统特色的同时，不断适应时代变化发展的要求。

（二）方言韵白的趋同与舞台语言的规范化

语言作为思维的外在表现和文化认同的关键载体，在《走西口》的表演艺术中形成了一种独特台语体系。这种语言形式以晋方言为基础，同时避免使用过于地域化的生僻词汇，创造了一种通用且具地方特色的艺术语言。既保留了晋语特有的声调韵律，又具标准化，便于在不同地区传播。

依托马克思主义语言理论，语言作为社会实践的产物，反映了社会关系的本质。《走西口》表演语言的趋同现象，实质上是晋陕两地移民在历史交往过程中形成的文化共识和心理认同。这种语言融合不仅展现了艺术表现手法，更深层次揭示了文化交融过程。它标志着经过长期互动，晋陕地区已经构建起一个文化共同体，即“西口文化圈”，在这个圈层内人们拥有相近情感与价值导向。例如，“哥哥”、“妹妹”、“走”、“家”等核心词汇的发音，既让两地观众感到亲切，又能让更多区域的观众理解；二人台唱词中对晋陕方言叠字与虚字衬词的大量运用，也为这种舞台语言的建构提供了活的语料（邵路垠 & 赵彬彬，2023）。

从语言发展规律来看，这种舞台语言的标准化过程符合语言社会化的演进趋势。《走西口》舞台语言的出现，正是为了满足跨地域文化交流的需要，在此过程中，语言保留区域特性且高度整合。

（三）审美风格的转变

《走西口》所展现的风格转型，本质上是移民群体社会心理在艺术领域的集中体现。晋剧原有激昂风格与黄土高原雄浑气质相融，再加上题材本身的悲情元素，最终形成了于悲壮处显坚韧的特征。

这种艺术特征并非创作者主观构想，而是晋陕移民复杂心理状态的创造性表达。他们既直面生存的艰难，又保持着对未来的憧憬。这种双重心理通过艺术家的提炼，最终转化为舞台上那种交叠共生的悲婉坚毅形象。有研究以“艰辛与辉煌”概括河曲民歌《走西口》所承载的移民生存史（加俊，2005）；可以说，“走西口”题材戏曲的审美价值，正在于它真实反映了特定历史条件下中国底层民众在苦难中不屈不挠的生命韧性和奋斗精神，这是中华民族精神在特定历史时空的艺术呈现。从美学理论分析，这种艺术风格的转变展现了悲剧精神与英雄气概的有机统一。《走西口》既刻画了个体在时代变迁中的无奈处境，又彰显了人类面对逆境时的顽强品格。

需要指出的是，这种艺术风格的生成，是历史演变逐步推进的结果。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走西口》呈现出不同的艺术特点，这印证了艺术与社会发展的紧密联系。比如在新中国成立后，该剧的表演更加强调抗争意识和进取精神，这反映了新时代背景下审美取向的转变。

五、戏曲艺术融合进程中的动因、意义与当代启示

传统戏曲跨地域融合并非偶然，而是历史语境、社会需求、艺术演进规律及文化传播逻辑协同作用的必然结果，既承载着戏曲自身传承革新的使命，也折射出特定时期地域文化互动、群体精神凝聚与社会变迁的深层内涵。晋陕戏曲以《走西口》为媒介的艺术融合，既是移民文化驱动的艺术实践，也是戏曲适应社会发展、回应民众精神需求的生动体现。系统剖析其融合动因、挖掘文化价值、提炼当代启示，既能深化对传统戏曲融合规律的学理认知，也能为当代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供理论支撑与可行实践路径。

（一）根本动因

晋陕地区戏曲艺术通过《走西口》这一经典剧目实现艺术融合的核心动力,源自“艺术传承以人为载体”这一本质特征。此处所指的“人”,特指具有相似历史背景和情感体验的移民观众群体。马克思主义认为,消费本身也是生产,因为它为生产提供了“想象的对象”(马克思 & 恩格斯,2012)。当移民观众欣赏《走西口》时,他们不仅是在进行艺术消费,更是在重新唤起并强化自身的情感共振与文化归属感。

在具体案例中,山西商人在呼和浩特听到乡音版《走西口》时的情感触动,陕西工匠在山西戏曲表演中获得的认同感,都表明了戏曲艺术已超越单纯的娱乐价值,演变为维系乡情、强化地域的身份共识的重要纽带。这种社会属性,有力地促进了不同戏曲流派为满足相同观众群体而走向融合。

从经济学角度看,这种精神诉求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文化消费领域,其需求直接影响着艺术创作的方向与表现形式。戏曲团体须顺应观众需求,不断推进艺术形式的革新与融合。这种市场调节机制虽非戏曲融合的唯一原因,但确实发挥着重要作用。

需要注意的是,这种精神需求带有明显的阶层特征。移民群体主要来自农民、手工业者等阶层,他们的审美取向与知识分子阶层存在差异。这种阶层特性使《走西口》在保持民间艺术特色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具有历史局限性。

(二) 文化意义

《走西口》推动的晋陕戏曲融合,核心文化价值在于塑造地区文化认同与民族共同体意识。艺术融合到一定阶段,其共同元素会成为群体精神联结的媒介,帮助晋陕民众突破地域局限,认清彼此共经苦难与荣光的历史共同体属性。

这一过程,与当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命题高度吻合。(聂栋瑶等,2025)的研究指出,“走西口”作为民族团结、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典范,其蕴含的民族精神及西口文化至今仍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走西口》凭借其艺术魅力,使这种历史经验与精神得以延续和传播,从而展现了艺术的积极能动作用。

从文化视角来看,这种共同体意识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观念建构过程。通过艺术化提炼与情感化表达,《走西口》不仅重现了历史,更重要的是塑造了特定的历史认知模式。值得注意的是,建构共同体意识是一个漫长而曲折的历史进程,期间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不同地域、不同群体间的文化差异。然而,正是通过这种差异中的对话和交流,才使得更广泛的共同体意识形成。

(三) 当代启示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2026)提出,“提升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水平,培育传承体验新场景”。晋陕地区戏曲艺术借助《走西口》实现跨区域融合的案例,为当代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参考。这一案例生动诠释了文化形态的生命力源于持续演进的社会生产活动。

有效的保护策略应当遵循文化演进的内在规律,积极促进传统艺术与现代文明的互动共生。具体而言,需要搭建跨地域的艺术对话平台,引导传统戏曲表现当代社会议题,并借助数字化传播手段拓展其受众范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发挥其以艺术的方式“掌握世界”的独特功能。

此外,晋陕戏曲的融合实践同时也揭示了文化传承必须扎根于其社会土壤。戏曲艺术的兴衰本质上取决于其回应民众精神需求的能力,以及其折射时代特征的程度。因此,非遗保护必须嵌入社会发展进程,与当代人的文化生活形成有机联系,才能在传承中实现创造性转化。

本研究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根本方法,将晋陕戏曲交融置于“走西口”跨区域人口迁徙的历史进程中加以考察,指出《走西口》剧目的生成与流变本质上是特定社会存在诉诸审美意识的产物,迁徙所带动的经济交往与文化碰撞为剧种融合提供了物质前提与历史动力,晋陕戏曲在声腔、表演与叙事范式上的互渗因而呈现出辩证扬弃的运动轨迹,不同剧种在坚守本体特质的前提下完成创造性转化与艺术升华,这种融合深植于社会变迁的内在需求而非表层技艺的移植。未来研究可进一步依托地方戏曲原始版本的

文献考据、口述史料采集与系统性田野调查,系统梳理“走西口”主题戏曲的跨地域传播脉络,可引入表演本体分析与受众群体调查等微观研究方法,同时聚焦数字媒介语境下该传统艺术的传承机制与创新路径,进而在多维度研究框架下阐释传统艺术适配当代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

参考文献

- 马克思,恩格斯.(20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35,151.
- 马克思,恩格斯.(20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649.
- 毛泽东.(1991).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861-862.
- 聂栋瑶,吴凡文,苏明辰.(2025).“走西口”促进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经验与当代价值.鹿城学刊,(1),19-23.
- 陕劲松.(2016).“走西口”中的民族交流与文化融合.山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72-75.
- 邵路垠,赵彬彬.(2023).黄河流域二人台艺术形式中的汉族、蒙古族文化交融现象.鲁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5),92-96.
- 闫天灵.(2004).汉族移民与近代内蒙古社会变迁研究.民族出版社.
- 殷梦高.(1758).保德州志(乾隆二十三年刻本).
-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2026年3月14日).人民日报,第1版.

作者简介

1. 刘依佳,硕士研究生,大连海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2. 于星月,硕士研究生,大连海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主要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
3. 王翊达,硕士研究生,大连海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4. 蔡静,博士,大连海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基金项目

大连海洋大学人文社科类重点项目“基于“学术领航+成长陪伴+价值引领”导向下的班导师育人工作创新机制研究”(BDSZX-ZD-202511)。